

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

——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

黎相宜 周 敏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移民通过文化馈赠这种跨国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但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不同类型的移民群体的跨国实践模式不尽相同。本文借鉴以往国际移民与跨国主义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社会地位补偿”的范式，对分别来自广东五邑开平与海南文昌下辖两个镇的移民群体进行比较。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移民对于侨乡的文化馈赠不仅受到其个人出国前后社会地位变化的制约，而且还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特定的祖籍国和移居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位置的差异，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的不同社会境遇以及侨乡的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均对文化馈赠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上述这些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社会地位补偿的特殊机制，影响移民跨国实践中的文化馈赠。

关键词：华人移民 华南侨乡 社会地位补偿 文化馈赠 跨国实践

一、研究缘起

国际移民^①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移民研究关注的重要主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国际移民汇款的快速增长更是引发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如何影响移民祖籍地发展问题的讨论。^②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跨国资本流动和投资行为等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强调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但移民汇款给移民祖籍地带来的社会和文化

* 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华人移民的社会地位补偿》(GD10YHQ01)的成果，同时获得2011年度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以及中山大学2010年笹川优秀青年奖学基金的资助。本文的核心观点受益于中山大学王宁教授，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陈杰一同进行了部分田野调查并提供大量修改意见。同时，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衷心感谢！文责自负。

^① 本文的“国际移民”定义沿用李明欢(2011:7)的定义：“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地居住达一年以上，即为‘国际移民’。”下文中的“华人移民”也参见此定义。

^② 官方报告显示，全球的海外移民汇款流量预计将超过4400亿美元。2010年海外移民汇款最大的输入地为印度、中国、墨西哥、菲律宾和法国(World Bank, 2010)。

效应却较少受到重视（波特斯、周敏，2011）。自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及放宽移民政策以来，海外的华人移民纷纷回乡积极参与侨乡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事务，尤为突出的是移民对于家乡的文化馈赠（cultural remittances）。这些馈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侨乡的文化发展，进而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不同祖籍地与移居地的移民群体对于各自家乡的文化馈赠并不相同，有些侨乡的文化馈赠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象，有些则呈衰落态势。

本研究借鉴以往的理论范式，兼顾祖籍地与移居地两种视角，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社会地位补偿的范式来解释这种不平衡的现象。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影响国际移民对家乡进行文化馈赠的机制。我们认为，华人移民对于侨乡的文化馈赠不仅与个人出国前后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还与祖籍国和移居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位置以及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的社会境遇有着密切关系。此外，侨乡的地方政府及社会出于经济发展、政治统战等各种考虑也对移民文化馈赠产生不同的影响。上述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一种特殊的机制——即社会地位补偿机制——来影响移民跨国实践中的文化馈赠。本文要具体探讨的是以下几个有关问题：社会地位补偿机制产生的主要动因是什么？这种机制如何运作？侨乡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如何为华人移民提供实现社会地位补偿的客观条件？社会地位补偿范式对不同祖籍地和移居地以及对有着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移民群体的解释力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我们通过对来自华南传统侨乡两个移民群体的田野调查资料的定性分析来解答这些问题。

二、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一个分析性的框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在移居地建立起新家庭、新社区的同时，仍与祖籍地进行着频繁而有序的金融、产业、贸易、文化、政治等活动。这种在祖籍地与移居地之间往返的生活方式被学者们称为“跨国实践”，它不仅满足了移民家庭在两地的经济需求，也降低了移民无法完全融入移居地主流社会所产生的不适应感和困扰（参见Basch et al., 1994: 6; Portes et al., 1999; Landolt, 2001）。“跨国实践”并不是新现象，但是当代跨国实践在规模、范围、深度、频率以及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上都与以往有所区别（Vertovec, 2004; 刘宏，

2003)。移民跨国实践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移民汇款(Glick-Schiller et al., 1992; Guarnizo et al., 2003; Smith, 2005)。国际移民汇款不仅包括用于支持侨眷生活的侨汇,还包括宗教馈赠(religious remittances)、政治馈赠(political remittances, 对于祖籍国民主及政治制度改革)以及社会馈赠(social remittances, 流动于移居地与祖籍地的观念、行为及社会资本)等(Grasmuck & Pessar, 1991; Gold, 2001; Goldring, 2004; Levitt, 1998; Levitt & Lamba-Nieves, 2011)。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馈赠”的概念(Flores, 2005)。

与其他国家的移民相比,华人移民除了生产性投资与用于支持家眷生活的侨汇外,很重要就是通过“文化馈赠”这种既非纯生产性也非纯消费性的方式,参与到跨国实践中来。“文化馈赠”主要包括移民无偿贡献于家乡公共文化事业(包括学校、图书馆、宗祠、寺庙等)的行动。^①很多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针对移民这种跨国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发展出族裔身份认同、道义约束、炫耀性消费、经济投资等四种主要范式,强调认同、道义约束、炫耀以及投资动机等因素对于文化馈赠的影响(柯群英, 2003: 52-55; 郑一省, 2004; 刘朝晖, 2005: 237-238; Kuah, 2000: 131-132; 李明欢, 1999, 2005; 王春光, 2000, 2002; 黄昆章、张应龙, 2003: 228; Smart & Lin, 2007)。

上述理论范式都试图从个人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特殊的跨国实践,但都没考虑到不同移民群体在跨国实践的行为模式上所存在的差异,似乎上述因素对于每种类型的华人移民群体的影响都是相同的。然而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不是所有的移民群体都热衷于对祖籍地的文化馈赠,有些移民群体对于祖籍地的文化馈赠明显要多于另一些移民群体,作为常量的认同、道义约束、炫耀以及投资动机等因素显然无法解释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其他国家的移民经验也证明,移民的人力资本(例如教育、职业技能、公民身份)以及其他人口特征(例如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跨国实践的形式和规模,而且移民群体所处的劣势社会地位(比如在移居地受到种族歧视和排斥)也会给跨国实践带来影响(Portes & Guarnizo, 1991)。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由移民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祖籍地和移居地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位置以及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的社会境遇等一系列因

^① 国内学术界常用“捐赠”来描述移民对于祖籍地的捐资。“捐赠”多指在西方公民社会语境下个体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无偿赠送行为。但移民对于祖籍地的影响往往是多重而复杂的,其汇款无偿投入的领域往往具有公共和私人的双重属性,“馈赠”更能够表述捐资中的私性成分。

素形成的社会机制不仅约束了认同、道义约束、炫耀及投资动机对于文化馈赠的影响，也决定了这种跨国实践的模式、范围和深度。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将着重讨论华人移民对于祖籍地的文化馈赠，并将之纳入到“社会地位补偿”范式来进行讨论。这个范式涉及到“社会地位”、“社会地位落差”、“社会地位补偿”等核心概念。“社会地位”的最早论述见于马克斯·韦伯（2010/1922）。本文所指的“社会地位”主要包括“社会声望”和“人际情感”两个面向（翟学伟，1999），关注的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性维度，并不试图从客观统计指标来考察移民的社会地位。因为对于移民个体来说，虽然在祖籍地拥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但在移居地往往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反馈与情感反馈。而当他们回到祖籍地，“观摩”与“标杆”的效应使主观感觉意义上的社会地位会比其在移居地的社会地位要高。这种象征意义上的“社会地位”尽管无法用客观指标准确测量，但却是能够被移民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行动者所感知到的“社会事实”，并对移民的跨国实践产生实质影响。“社会地位落差”指的是由于国际迁移以及祖籍国与移居国（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差异，所造成的移民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社会地位不一致性。“社会地位补偿”主要指国际移民由于在跨国空间下社会地位不一致性导致的补偿心理及采取的社会行动。“社会地位补偿”并不是新概念，王春光（2000：161）对巴黎温州人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启发。他指出，中国官方赋予华侨很高的地位与礼遇，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温州人在巴黎所处的边缘地位的缺憾。

本文提出的社会地位补偿范式，试图将宏观层面的民族国家、中观层面的侨乡与微观层面的移民个体联系起来，通过考查这几个不同层面的因素的互动来解释不同祖籍地与移居地的移民群体对家乡文化馈赠的差异。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看，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从西欧、北美、大洋洲和日本不断向外扩张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国际移民在这种背景下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寻求更好的生存机会。祖籍国与移居国（尤其是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差异以及群体在移居地的边缘化社会境遇，造成移民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社会地位落差。这种社会地位落差越大，移民社会地位补偿的成本就越低，其实现社会地位补偿的可能性就越高。从中观层面来看，侨乡地方政府及地方社会是社会地位补偿的重要供给者。侨乡地方政府主要包括市、镇政府、地方侨务部门以及

村委会；而地方社会则主要涉及侨眷、侨刊、宗族组织以及侨乡当地的地缘、业缘组织。这些结构因素都会制约移民群体对于家乡的文化馈赠。

三、研究方法及个案介绍

考虑到海外移民群体的多样性，根据祖籍地与移居地的差异，本文将焦点放在广东五邑开平与海南文昌这两个传统侨乡的移民群体上。开平侨乡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其海外移民及其后裔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文昌侨乡位于海南省东北部，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基本信息见表 1：

表 1 广东开平与海南文昌侨乡的比较数据^①

侨乡	侨乡总人口	海外华侨华人、 港澳台同胞	文化馈赠总 额	平均每人馈赠 数额	侨乡平均每人 受惠数额
广东开平	68.76 万人	75 万人	10 亿元	1333 元	1454 元
海南文昌	58.46 万人	118 万人	3.81 亿元	323 元	650 元

从表 1 可见，开平海外乡亲平均每人对家乡的文化馈赠数额是文昌的四倍，而开平平均每人受惠的数额是文昌的两倍。这反映了两地移民在文化馈赠上的明显差异。为了方便比较，本文分别从开平与文昌抽取坎镇与文镇的移民群体作为个案。^②希望通过实地观察、深入访谈、追踪调查和文献法等方法，寻找导致文化馈赠呈现差异的原因。

四、坎镇移民：“叹世界”的“金山客”^③

下文我们将分析坎镇籍移民所面临的社会地位落差、社会地位补偿成本以及坎镇地方社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① 在我们所搜集到的政府官方数据中（《江门统计年鉴 2010》；《海南统计年鉴 2011》；开平市外事侨务办公室编，2010；文昌市外事侨务办公室编，2008），港澳台同胞往往与华侨华人放在一起统计，并没有针对移民的单独统计数据。但因两地统计口径一致，因此数据具有可比性。

^② 为方便起见，下文将坎镇籍移民简称为坎镇移民，文镇籍移民简称为文镇移民。

^③ “金山客”，侨乡对移居北美的海外移民的称呼。

（一）社会地位落差的形成：从“捱”到“叹”

坎镇移民来自广东省的“五邑^①侨乡”，跨国移民历史悠久。从19世纪中叶始，大批中国劳工到北美和拉丁美洲的西方殖民地国家打工，名为“淘金”，实为“卖猪仔”、做苦力。尽管国际移民潮起潮落，但是二战前迁移到美洲的中国移民人口中，五邑籍的华人移民还是占绝大多数，主要流向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二战后，坎镇与海外中断关系近30年。随着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北美国家移民法的重大改革和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五邑侨乡依靠着“移民链”的侨乡优势重新成为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重要输出地之一。坎镇的移民在“推”和“拉”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从70年代末开始，持续不断地向北美迁移。从目前的形势看，这种迁移的趋势还将持续。由于坎镇移民的移居地（北美国家）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处于中心位置，这个群体在移居地的生活充满着艰辛，但其返乡探亲的生活却既惬意又享受。移民往往用“捱世界”与“叹世界”来形容自己的海外与回乡生活。^②“捱”与“叹”深刻地反映出移民在移居地与祖籍地之间的社会地位落差。老移民由于文化素质不高，只能从事一些劳动力密集型工作。尽管新移民的教育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由于不会英文以及缺乏北美国家认可的文凭与技术资格，大多数仍在唐人街里的华人族裔经济中就业。而且由于移民时间短，新移民不仅受到移居地主流社会的排斥，甚至在华人社会内部也处于边缘地位。一位新移民这样说：

我在国内受的高等教育，在这边不懂英文等于没有用，只能在这边“捱世界”，给这些老华侨打工。我当初如果留在国内都已经是大老板了，可以退休“叹世界”了。^③

此外，由于受到族裔以及其他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加入移居国国籍的移民也仍被当地主流社会视作“永远的外国人”，饱受“他者”身份的困扰。曾担任过洛杉矶中华会馆主席的伍先生说：

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不是我不想做美国人，是人家不让你

^① “五邑”，指广东省江门市所辖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五个区县市。

^② “叹世界”与“捱世界”是粤语的表达方式。“叹世界”在粤语中是风光潇洒地享受生活的意思，同时带有周游世界之义，五邑移民常用来形容自己跨国享受生活的状态。“捱世界”俗称“熬日子”，这是从做劳工、苦力的老一代移民延续下来的移民精神。

^③ 2011年9月15日，笔者在洛杉矶唐人街对坎镇移民吴先生的访谈。

做美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他们认为你是永远的“外国人”。即便美国人称你是华裔美国人 (Chinese American), 但他们并不是真把你当作 American, 他们还是觉得你就是个 Chinese。^①

移居国与祖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位置的差异, 以及移民群体在“强势客文化区域” (李亦园, 2002: 13) 中的边缘化境遇, 加之移民个体在移民前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 共同导致了移民社会地位落差的形成, 也影响其实现社会地位补偿的成本。

(二) “低廉”的社会地位补偿成本

大部分坎镇移民在移居国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高, 还时常处于主流社会和华人社会的边缘位置。但由于祖国与移居国之间存在着货币汇率的差额, 所以当移民将海外赚来的“辛苦钱”带回侨乡时出现了价值“膨胀”, 这极大地提高了移民进行社会地位补偿的能力。而且虽然移民在北美地区的平均收入属于中等偏下, 但是与祖国的平均收入相比要高,^②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地位补偿成本。移居美国的关先生就是典型例子。关先生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移民, 在洛杉矶的华人餐馆打工 10 年, 现已退休。关先生于 2010 年年底回乡探亲, 捐给关族图书馆 3 万元。访谈中, 他说道:

3 万元人民币也就是 4 千多美金。我虽说退休金不多, 每月有 800 美金, 所以也不是说出不起, 也就是 4、5 个月的退休金。难得回来一趟, 肯定是要给图书馆的, 支持一下家乡嘛。^③

对于经济状况非常普通的关先生来说, 4 千多美金虽不是小数目, 但并没有超出他的能力范围。而对于关族图书馆来说, 3 万元人民币带来的社会效用是显著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访谈中提到:

今年图书馆有收到关先生的 3 万元, 算是比较多了。我们图书馆每个季度要出月报, 这些钱够出三个季度的侨刊了。虽然说

^① 2011 年 10 月 5 日, 笔者在洛杉矶唐人街对坎镇移民伍先生的访谈。

^② 根据《广东统计年鉴 2010》, 2009 年开平市人均 GDP 为 24886 元人民币。而根据我们调查, 开平移民在北美一年的人均 GDP 为 30000 美元左右。根据估算, 移民在北美的收入是开平本地人均 GDP 的 7-8 倍。

^③ 2010 年 11 月 3 日, 笔者在开平坎镇对关先生的访谈。

现在人民币是升值了，但是美金怎么说也是有 6 点几的汇率。^①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对于在移居国从事低薪工作的普通移民来说，将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部分存款用于侨乡的文化馈赠，就足以在侨乡地方社会获得一定的声望与地位，实现移民回乡“叹世界”的愿望。尽管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坎镇移民进行社会地位补偿的成本仍然相对低廉。一方面，社会地位落差与低廉的补偿成本增强了移民进行文化馈赠的意愿与能力；另一方面侨乡为移民提供的社会地位补偿又有效地促进了文化馈赠的实现。

（三）社会地位补偿供给的持续

坎镇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是移民社会地位补偿的重要供给者。他们在为移民提供社会地位补偿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 侨乡地方政府：创造“威水史”^②

改革开放后，“海外关系”逐渐被国家当作重要资源，侨乡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各种“联系亲情”的方式达到吸引外资、发展本地经济的目的。在这种背景下，坎镇政府及相关的侨办、侨联乃至上一级的市政府利用官方的资源，为回乡进行文化馈赠的海外乡亲提供了各种名誉资源与“政治待遇”，这形成了事实上的社会地位补偿。比如捐赠工程竣工会举行大型仪式，捐赠建筑经常以捐赠者名字来命名，各级政府为海外乡亲提供高规格的接待、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牌奖状，以及推荐其担任各级政协委员等，都传达了对为家乡做出贡献的海外乡亲的一种认可与回报。侨乡政府擅长通过“血浓于水”的意涵来激发海外乡亲对祖国家乡的认同，官方话语也强调歌颂华人移民爱国爱乡的美德，而华人移民们也都乐见其成。对于很多处于移居地边缘地位的移民来说，得到这样的“美誉”无疑是一件很“威水”的事。

任多家海外社团领导的李先生于 1988 年移民美国。由于工作时间不长，他每月只能领政府的救济金。但他在访谈中只字不提及此事，反而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自己受到国家及地方领导人接待的“威水史”：

9 月 28 日我要去参加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宴请华人庆祝国庆的盛会。一般都是对家乡有重大贡献的华侨才能被邀请出席这个

^① 2010 年 11 月 3 日，笔者在开平坎镇对关族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访谈。

^② “威水”，在粤语中有“威风”、“有威望”、“有地位”的意思。

宴会。现在很多国家领导人来洛杉矶访问，都是我们社团参与接待的，比如朱镕基和江泽民。我回去一般都给市领导打电话，让他们接机，这次我回来，市侨务局局长还说亲自来接我。^①

从李先生的讲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移民来说，能够得到祖籍国政府官员的接待，是“荣誉的象征和信任的表现”。坎镇侨乡地方政府在程式化的侨务接待中，力所能及地给予移民在回乡生活上的方便以及人际情感方面的积极回应，这不仅极大地补偿了移民在移居地的边缘境遇，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移民在侨乡的社会声望。实际上，抱着与李先生相似心态的华人移民并不在少数。大多数坎镇移民非常热衷于与政府官员保持密切的关系，不少人都以能拜会或受到侨乡各级政府领导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为荣。很多人还会将与领导人的合照摆放在（包括移居地与祖籍地的）家中显眼的位置。

2. 地方性网络：光宗耀祖的展演舞台

关族是坎镇人数最多的宗族，旅居海外及港澳台的人数有5万以上，大多分布在北美洲。关族以关族图书馆^②为纽带，建立起了紧密的、拥有广泛跨国联系的地方性网络。下面以关族图书馆为个案，考察地方性网络是如何为移民提供社会地位补偿的。关族图书馆于1936年建成，曾由于战乱几度被迫停办。在海外族人鼎力捐助下，图书馆在1982年重新开放。自复馆后，关族图书馆既是关族移民进行文化馈赠的重点对象，也担任着为本族移民尤其是热心图书馆、学校、宗祠、族谱修撰等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者提供社会地位补偿的角色。

美籍华人关先生的就是一个例子。关先生原来是广东某建筑设计院的中层领导，六十岁时由远嫁美国旧金山的女儿申请他及太太到国外生活。关先生到美国后，主要在餐馆里打杂，工作到七十多岁才退休。我们在美国访谈他的时候，他这么描述移民前后的心境变化：“未来金山羡金山，到了金山怨金山”。^③关先生于2010年年末回乡探亲并拜访了关族图书馆，以下是当时的田野记录：

大约在早上9点的时候，图书馆的门口已经打出“欢迎旅美乡

^① 2011年9月7日，笔者在美国洛杉矶唐人街对坎镇移民李先生的访谈。

^② 关族图书馆的功能相当于宗族委员会，其与“光裕堂”（坎镇关族的堂号）在人员、活动范围以及功能上并无很大差异，只是在中国的情境下，图书馆作为公共事业更易于开展活动。因此，下文所讲的关族图书馆也包括关族光裕堂。

^③ 2011年10月27日，笔者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对坎镇移民关先生的访谈。

亲关**“回乡恩亲”字样的红色横幅。当准备工作完毕之后，大家开始翘首以待客人的到来。关氏夫妇在11点左右到了关族图书馆。所有图书馆的理事一齐簇拥着关氏夫妇进入图书馆。关氏夫妇被安排坐在中央，其他人按职务大小围着关先生就座。接着，关先生和大家聊起了家常，在座的图书馆理事连连附和。大概寒暄了有一刻钟的时间，关先生这时拿出10张100元美金说：“这是给图书馆的。”接着再拿出4张100元美金说：“还有这些是给大家兄弟们喝茶的。”图书馆出纳接到钱马上开出收据，并把收据恭敬地递给关先生，关先生看也不看就顺手给了他太太，并继续与大家寒暄。大概11点多的时候，关先生起身表示事务繁忙准备离开。图书馆副主任提议大家在图书馆门口合影留念。之后，图书馆主任等一千人等把关氏夫妇一直送到门口外很远。^①

在侨乡“小传统”（Redfield,1956）的道德逻辑中，财产越多、权力越大、越有资源的人越有能力为社会负起责任，这种小传统既影响了侨乡对于移民个体的社会期许，也制约着移民对自身道德行为的自我期许。这个逻辑从反向来推理的话就是：移民对于侨乡的贡献越大，就越说明他在海外“赚到大钱”、“衣锦还乡”了。尽管在上述个案中，移民在海外赚取的是微小的“辛苦钱”，作为补偿者的关族图书馆也并非对移民在海外的艰辛生活一无所知，但图书馆的理事们刻意避免提及关先生在美国的境遇，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来接待关家一行人。从欢迎横幅、热情簇拥、座位安排到依依不舍的送别，这一整套侨乡固定的“迎来送往”的仪式文化展演模式，使得漂泊海外、历经艰辛的移民能够获得人际情感上的抚慰与温暖并从中获得社会声望。

3. 侨刊：颂扬海外乡亲的“集体家书”

侨刊是在侨乡编辑出版并寄往海外的“集体家书”（梅伟强，2007；Hsu, 2000: 124）。我们以坎镇关族筹办《光裕月报》为个案，考查侨刊作为社会地位补偿的提供者，在移民回乡进行文化馈赠方面所扮演角色。月报主要发往世界各地关氏族亲居住的地方。除联络乡情外，侨刊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捐赠者提供社会声誉方面的补偿。刊中多见各种“表扬信”，主要为颂扬回乡热心捐赠者的美德。月报上有一则报道加拿大侨领谢女士回乡进行文化馈赠的事迹：

^① 2010年11月9日，笔者在坎镇关族图书馆做的田野调查记录。

赤子情深 旅加谢 XX 宗婣乡土情深

.....

谢 XX 宗婣.....当日就通知亲朋戚友及同事等 30 多人在凯旋门酒店二楼加拿大厅，宴开三席饮茶，食饭，相互倾谈离别情，谢 XX 还向在席各人分发红包，场面十分热闹，我们大家十分高兴。关族图书馆有 7 位理事参加宴会。她对关族光裕堂特别关心，当时即向光裕堂捐助人民币叁万元，另向关族图书馆和光裕月报社各捐助人民币 500 元。关族图书馆管委会同人万分感谢，并通过讨论一致认为谢*宗婣素来关心支持我们关族图书馆，为我们图书馆发展增添了力量，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她的，为了答谢谢*宗婣的善举，决定为谢 XX 宗婣刻制一帧瓷相放在光裕堂前厅以作留念，以启迪后人学习她爱国爱乡热心教育的高尚情操。^①

上述故事的主人公谢女士于 1980 年移民加拿大，她用了“捱”字来形容在海外的十年售货员生活。^②这种由于跨国空间所造成的移民个体的社会地位落差，为其接受社会地位补偿提供了前提。谢女士在倾诉完其在海外的艰苦生活后，最后才“顺带”提及她捐给关族宗祠的 3 万元人民币，语气平淡。与《光裕月报》略带夸张的热情赞美相比，谢女士的自我阐述显得轻描淡写。这多少反映出文化馈赠者和社会地位补偿供给者所遵循的不同“表演规范”。在这种差异表演的转换与承接中，馈赠者最终获得了社会声誉的补偿。

作为补偿供给者的侨刊及其工作人员，出于希望移民更多捐资支持本宗族事务的动机，在侨刊的编排以及与海外宗亲沟通的过程中，都非常注重给予馈赠者一定的声誉补偿。一位侨刊的负责人说：

国内人民币给 300 元以上，国外美金或加币给 100 元以上，捐赠者的照片都登在月报的第一页。这些对于华侨来说是很重要的。你再有钱，别人不知道你有钱也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你有钱的话，捐多点，那就上照片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③

除了通过将声誉补偿作为一套模式固定下来外，侨刊还通过传递

^① 《光裕月报》复刊 112 期（2010 年 10 月至 12 月），内部资料，第 26 页。

^② 在粤语里，“捱”有煎熬、忍受的意思。

^③ 2010 年 12 月 29 日，笔者在广东开平坎镇对《光裕月报》工作人员关先生的访谈。

中国及侨乡社会的情况，维持华人移民对于家乡的印象及从未离开的感觉，从而把华人移民和家乡联结成一个虽分属不同空间却有相同生活体验的共同体，为远在他乡的移民提供身份及归属感缺失的补偿。

五、文镇移民：“归番”^①的“南洋客”^②

与坎镇一样，文镇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国际移民历史的传统侨乡，但两地移民由于祖籍地与移居地的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跨国行为模式。下面以文镇移民为个案，解释移居地与祖籍地之间差距减少、补偿成本升高以及侨乡的补偿供给减少给移民文化馈赠带来的影响。

（一）社会地位落差的缩小：从“归根”到“生根”

文镇移民大多移居东南亚，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得以在海外安家立业，自然繁衍。东南亚地区属于“弱势客地文化区域”（李亦园，2002：13）。从资本主义扩张开始，欧洲殖民者陆续来到东南亚（主要是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建立上层的经贸与管理体制，而新来的华人移民则成为介于殖民者与多数土著之间的中间阶层，在社会的夹缝中自我创业，发展华人的族裔经济。二战后东南亚地区纷纷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历史上华人移民“少数中间人”（middleman minority）的身份，殖民主义制度瓦解后部分华人移民的利益接收者角色，再加上“红色中国”（Red China）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使移居国——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对他们产生了疑惧。大部分移民迫于压力，加入移居国国籍，完成了从“华侨”到“华人”的国民身份转变，逐渐接受移居地的评价标准，融入移居国的主流社会。

改革开放后，文镇的部分人依靠原有“移民链”的优势移居海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逆转，导致传统的“移民链”和东南亚的移民接受国失去一定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以出国留学、涉外婚姻等新兴迁移方式也没有在文镇兴起。老一代移民渐渐融入移居国社会以及新移民人口发展缓慢，共同影响了移民社会地位落差的变化以及对于馈

^① 由于受到汉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在文昌侨乡的语境中，“番”代表移居地，“归番”意指移民融入并同化于移居地主流社会。

^② “南洋客”，侨乡对于移居东南亚的海外乡亲的称呼。

赠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老一代移民怀抱着中断三十年而无法抒发的家乡情结，纷纷回乡捐资公共文化事业。但从90年代以后，移民对家乡的文化馈赠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一位老移民如此回应：

现在老家的政府也有钱了，不需要依靠我们华侨了。而且很多华侨在东南亚生活得也不是很好，所以即使捐，现在华侨捐的那点钱其实还不够，很多时候还得政府补贴，所以政府现在也不是特别重视华侨捐赠了。^①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发现随着侨乡本地经济的发展，侨乡与移居地之间的差距逐渐变小，同样的馈赠数额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得到的社会效应远高于当下。在这种背景下，移民在祖籍地与移居地的社会地位落差也逐年缩小，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地位补偿的成本。

（二）“昂贵”的社会地位补偿成本

如上所述，在文镇，移民进行社会地位补偿的成本——文化馈赠的费用——不断提高，这进一步削弱了移民的馈赠能力和积极性。我们以文镇一所华侨中学的历史发展为个案进行说明。1985年12月，文镇冠南墟的地方精英们为筹办冠南华侨中学，向海外乡亲发了第一封名为《筹办“冠南华侨中学”告海内外同胞书》的“动员信”：

……冠南地区偏僻，人口众多，学生来源面广，交通很不方便……至于许多学生中途辍学，这是造成我区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目前只需三至四万元增建两座教室，几间宿舍，数十付桌椅，即可兴办起来。……为此，特向海内外各界人士疾呼：恳请本着一向热衷办学的精神，群策群力，解囊输将，俾集腋以成裘，共襄善举，完成上级赋予我们的神圣任务……捐款奖励条例：捐款数量不计多少，一律在墙壁上勒名留念。捐款达壹万元以上者，除以一间教室命名及挂玉相留念外并照顾两名亲属子女三年免收学什费。捐款达伍仟元以上者，除以一间宿舍命名及挂玉相留念外并照顾壹名亲属子女三年免收学什费。捐款达三千元以上者，除挂玉相留念外并照顾壹名亲属子女三年免收学费。捐款达

^① 2011年2月11日，笔者在海南文昌文镇对新加坡籍华人严先生的访谈。

壹仟元以上者，悬挂十二寸肖相（像）留念。捐款达伍佰元以上者，悬挂十寸肖相（像）留念。^①

“动员书”发往海外后，文镇移民总共捐了人民币 48576 元，超过了预期的“三至四万元”。3 年后，冠南华侨中学成立。但由于教学楼不足。地方精英以冠南华侨中学董事会的名义于 1990 年又写了一封“动员信”，希望能够动员更多的海外乡亲捐资筹建教学楼：

……校董会根据一所初级中学所需用地及校舍规模……根据目前造价估计，最低限度需要人民币伍拾万元……为此吁请慷慨相助，热烈输将，集腋成裘，共襄义举，此不仅于家国有利，子女受惠，就捐献者亦自德泽长流，流芳后世焉……捐款奖励条例：凡乐捐达拾万元以上能建教学楼一层（二百四十平方）者，除以该层楼命名及悬挂二十寸彩相留念外，并照顾三名亲属子女三年免费入校读书。凡乐捐达伍万元以上能建教室两间者，除以教室命名及悬挂二十寸彩相留念外，并照顾两名亲属子女三年免费入学读书。凡乐捐达两万元以上能建一间教室者，除以教室命名及悬挂十八寸彩相留念外，并照顾一名亲属子女三年免费入学读书。凡乐捐达壹万元以上能建一间宿舍者，以该宿舍命名及悬挂十六寸彩相留念。凡乐捐达伍仟元以上为学校配套建设者，悬挂十四寸彩相留念。凡乐捐达壹仟元以上为学校配套建设者，悬挂十二寸彩相留念。凡乐捐无论多少，芳名勒碑留念。^②

从以上两封“动员信”的内容来看，侨乡地方社会向海外乡亲动员的数额在短短 5 年里发生了变化：从建校之初的“三至四万元”到 1990 年的“五十万元”。这反映出移民社会地位补偿成本随着侨乡本地经济发展而逐年升高。侨乡社会对于移民的要求已经不仅是当初的微薄资助，而是要切实解决燃眉之急。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捐款奖励条例”上，第一封信的最高捐款额奖励为 1 万元，而第二封则多出了捐 10、5、2 万元的条例规定，显然是想通过提高最高奖励额度，增加捐款数额，以凑足 50 万的数额。然而 50 万对于在东南亚生活的海外乡亲来说也

^① 2010 年 2 月，笔者在文镇冠南书报社获得的资料。

^② 2010 年 2 月，笔者在文镇冠南书报社获得的资料。

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数额。尽管华人移民的收入在移居地社会属于中等甚至偏高，但是他们的收入与祖籍地的平均收入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优势。^①而且到了 90 年代，许多解放前迁移到东南亚的老移民都相继去世，新移民以及移民第二代与家乡的联系难以维系。第二封信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晚的一封与中学捐资相关的侨信，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地位补偿上升的过程。此后，冠南华侨中学获得的侨捐日益减少，加之前来就读的学生人数减少而未逃脱被撤并的命运。

可见，移民补偿成本的升高使得潜在的馈赠者望而却步，削弱了移民进行文化馈赠的意愿与能力，而侨乡对于移民地位补偿供给的减少则直接影响了文化馈赠的实现。

（三）社会地位补偿供给的弱化

1. 侨乡地方政府：“不缺钱”

在侨乡，华人移民的“华侨”、“华人”身份曾具有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也进一步强化了其对侨乡的归属感。然而，作为社会地位补偿的供给者的文镇地方政府，为移民提供的补偿力度却经历了一个由强至弱的变化。从马来西亚华人王先生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

我第一次回来是 1982 年，当时是国务院邀请我们回来的。到了文昌，市委书记、侨办主任、侨联的人，都过去机场接我。那个阵势很大，有两个女孩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马来西亚侨领王 X 先生省亲归里。我回来以前都打电话给市侨办、市侨联，他们派车去接我，然后送回家乡，现在就没有了。我以前回文镇也捐了很多钱啊，小学的校长伸手要钱我就给。现在中国人太有钱了，生活水平也好了，村里的人也不需要你给的 100、200 元的。你不来问我要，我也就不给了。我叫冠南小学的校长来吃饭，他没有来，我就没有再捐钱了。^②

从王先生的故事可以看出，文镇所给予移民优越感的身份及归属

^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权威数据统计，2010 年东南亚国家的人均 GDP 为 9187.8 美元。由于华人移民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达到甚至超过平均水平，因此东南亚的人均 GDP 可用作其在移居地平均收入的参考值。根据《海南统计年鉴 2010》，文昌市 2010 年人均 GDP 为 20446 元人民币。东南亚国家人均 GDP 是文昌本地人均 GDP 的两到三倍。即使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文镇与东南亚地区在人均 GDP 上的差距也远没有坎镇与北美国家的差距大。

^② 2011 年 2 月 12 日，笔者在文镇对侨领王先生的访谈。

感的补偿在逐年下降,从“市委书记、侨办主任、侨联的人都去机场接”的“大阵势”到“现在就没有了”、从“伸手要钱”到请校长吃饭人也不来的表述中,隐约可以感到侨领王先生作为移民其优越感丧失所伴随而来的失落。文镇主管侨务的黄先生的谈话也可作为印证:

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好了,政府口袋也有钱了,没必要向华侨伸手要钱了。以前我们很穷,办学啊、办书社啊都是需要华侨捐钱。华侨回来看到学校和医院这么破旧,也会给些钱。我们现在基本上小华侨那些就不接待了,都是他们自己和这边的亲属联系。如果真是很大的侨领的话,可能是市里接待,我们也不怎么接待了。现在对于华侨的这种迎来送往比较少了。^①

尽管黄先生表示大侨领还是会由市级政府接待,但其话语中的“大侨领”的衡量标准也在逐年提高,已远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标准。随着社会地位补偿成本的提高,侨乡给移民带来声望及情感上的反馈越来越少,移民所获得的社会地位补偿也随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2. 地方性网络:“留名”的淡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镇侨乡地方社会所构建出来的补偿体系对于移民的吸引力在逐渐减弱。这主要受到国民身份转变与评价体系转移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开始建立起各自的民族国家。与此同时,文镇海外华人移民的身份面临着从“华侨”到“华人”的转变。这种转变给文镇地方社会在为华人移民提供身份及归属感补偿时带来了一些阻碍和尴尬。文镇移民在移居地社会并没有像坎镇移民那样面临严重的身份及归属感的缺失;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明确表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等等。其身份及归属感的补偿需求因而也慢慢降低了。可见,随着移民从“华侨”到“华人”的政治身份转变,地方性网络所构建的补偿体系对于文镇移民的吸引力进一步淡化,从而影响了华人移民对于侨乡的文化馈赠。

另一方面,随着国民身份的转变,移民的评价标准也从祖籍地转移到了移居地,这使地方性网络提供的声誉补偿对移民的吸引力也急剧下降。林氏宗祠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林氏宗祠位于文昌市中心,主要由文镇的林氏宗亲捐钱兴建。林氏宗祠除了在清明节还显得比较

^① 2011年2月15日,笔者在文镇对主管侨务政协副主席黄先生的访谈。

热闹之外，平常并没有人员打理看管。宗祠时常会租借场地给一些中小学补习班以弥补资金的短缺。文化馈赠作为华人移民的传统仍然在延续，但是很多海外的林氏宗亲更倾向于捐钱给移居地的林氏宗亲组织，而不是将善款远涉重洋捐给祖籍地的宗亲组织。其原因在于所谓“留名”的社会声誉补偿对于移民的吸引力远不如从前。随着移民身份认同和生活中心的转变，很多移民逐渐接受移居地的评价标准，从移居地获得社会价值与声誉地位，这导致他们并不太在乎侨乡地方社会所提供的评价体系。从林氏宗祠的例子可以看出，由于华人移民不再像以前那样渴望来自侨乡社会所提供的“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等方面的社会声望补偿，而且为移民提供社会地位补偿的地方精英已经逐渐离世，文镇的文化馈赠随着补偿动机与主体的缺失而衰落。

六、比较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上述两个案例的比较，采用社会地位补偿的范式来解释不同祖籍地与移居地的移民群体在跨国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差异。从宏观层面来说，由于祖籍国与移居国（尤其是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差异以及群体在移居地的边缘化社会境遇，造成移民在时空上的社会地位落差。另外，移民在移居地的平均收入远高于祖籍地，这导致移民通过文化馈赠而获得社会地位补偿的成本低廉，为其实现社会地位补偿提供了可能性，这是坎镇的例子。而文镇的情况则相反，由于祖籍地与移居地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位置变化以及移民很大程度上融入移居地社会，使移民的社会地位落差逐年缩小。加之移民的平均收入在祖籍地没有优势，致使补偿成本与日俱增，导致移民进行文化馈赠的意愿以及能力的削弱。

宏观因素只是制约了社会地位补偿实现的可能性，侨乡地方政府及地方社会等中观因素则直接影响了移民社会地位补偿的实现。从坎镇来说，作为侨乡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统战等政治需要，不遗余力地为进行文化馈赠的移民创造各种“威水史”，极大地补偿了移民由于在移居地边缘化境遇所面临的社会地位落差。与此同时，拥有广泛跨国联系的地方性网络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展演舞台，侨刊更是持续颂扬海外乡亲的“丰功伟绩”。这些地方性因素积极地促进了文化馈赠的实现。而移民的社会地位在家乡得到认

可又进一步强化了其补偿心态，从而更利于移民对家乡的持续支持。而文镇则受到两地经济差距减少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已经融入于移居地社会的移民进行文化馈赠的热情减弱，地方政府也不再有太大的兴趣为“资本不甚雄厚”的海外乡亲提供“迎来送往”的“亲情接待”。同时，侨乡地方性网络所提供的补偿体系失去吸引力。社会地位补偿的弱化使得移民进一步减少了对于家乡的文化馈赠。

可见，移民对于家乡的文化馈赠并不是源源不断的，这种馈赠不仅受到祖籍国与移居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位置等宏观因素制约，还受到移民群体在祖籍地与移居地的社会境遇、侨乡的地方政府及地方社会所采取的对应策略等中观因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机制——社会地位补偿机制，来影响移民跨国实践中的文化馈赠。其一，祖籍国与移居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差距越大，移民在移居国的社会边缘化程度越高，移民所面临的社会地位落差也就越大。其二，社会地位落差越大，移民在移居地的平均收入与祖籍地平均收入的比率越高，其进行社会地位补偿的成本越低，实现社会地位补偿的能力与意愿也就越强。其三，侨乡为移民所提供的社会地位补偿的供给越持续，移民进行地位补偿的意愿也就越强。移民个体的能力和意愿的加强，促进其对于家乡的文化馈赠的具体行动。此社会地位补偿机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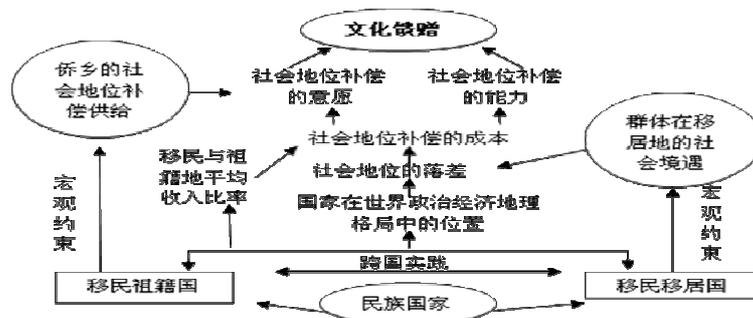


图 1 社会地位补偿机制

本文主要采用社会地位补偿机制来讨论华人移民的文化馈赠这一特殊的跨国实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华人移民的跨国实践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和模式，如广泛参与祖籍地的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积极投身各种跨国社团及世界联谊会等。有研究表明，拥有高社会经济

地位的移民更倾向于参与跨国活动（波特斯、周敏，2011）。社会地位补偿机制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移民的跨国实践模式。同时，社会地位补偿机制是否能够解释来自其他社会经济背景的移民的跨国实践，还有待于以后进一步深入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 波特斯，阿列汗德罗、周敏，2011，《国际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与移民祖籍国的发展：美国墨西哥裔和华裔社团的比较》，《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3卷第1期。
- 《广东统计年鉴2010》，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海南统计年鉴2011》，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黄昆章、张应龙，2003，《华侨华人与中国侨乡的现代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江门统计年鉴2010》，2010，江门市统计局内部资料。
- 开平市外事侨务办公室编，2010，《历年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捐赠统计》，内部资料。
- 柯群英，2003，《福建侨乡中文化资本与祭祖的关系》，周大明、柯群英主编《侨乡移民与地方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明欢，1999，《相对失落与连锁反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社会学研究》第5期。
- ，2005，《“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
- ，2011，《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李亦园，2002，《中国社科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成立并举办“海外华人研究研讨会”祝贺词——兼谈海外华人研究的若干理论范式》，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刘朝晖，2005，《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北京：民族出版社。
- 刘宏，2003，《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梅伟强，2007，《“集体家书”连五洲——五邑侨刊乡讯研究(1978-2005)》，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 王春光，2000，《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2002，《移民的行动抉择与网络依赖——对温州侨乡现象的社会学透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
- 韦伯，马克思，2010/1922，《经济与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文昌市外事侨务办公室编，2008，《文昌市海外乡亲捐赠芳名录》，内部资料。
- 翟学伟，1999，《个人地位：一个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中国日常社会的真实建构》，《中国社会

科学》第4期。

郑一省, 2004, 《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东南亚研究》第2期。

Basch, Linda, Nina Glick-Schiller & Cristina Blanc-Szanton 1994,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 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itorialized Nation States*. Langhorne, PA: Gordon and Breach.

Burman, Jenny 2002, "Remittance: Or, Diasporic Economies of Yearning." *Small Axe* 6 (2).

Flores, Juan 2005, "The Diaspora Strikes Back: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Remittances."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39 (3).

Glick-Schiller, Nina, Linda Basch & Cristina Blanc-Szanton 1992, 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In Nina Glick-Schiller, Linda Basch & Cristina Blanc-Szanton (eds.),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New York: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Gold, Steven 2001, "Gender, Class, and Network: Social Structure and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ransnational Israelis." *Global Networks* 1.

Goldring, Luin 2004, "Family and Collective Remittances to Mexico: A Multi-dimensional Typolog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5 (4).

Grasmuck, Sherri & Patricia R. Pessar 1991, *Between Two Islands: Dominic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uarnizo, Luis E., Alejandro Portes & William Haller 2003, "Assimila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Action among Contemporary Migra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Hsu, Madeline 2000, "Migration and Native Place: Qiaokan and the Imagined Community of Taishan County, Guangdong, 1893-1993."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2).

Kuah, Khun Eng 2000, *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 Aldershot: Ashgate.

Landolt, Patricia 2001, "Salvadoran Economic Transnationalism: Embedded Strategies for Household Maintenance,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Expansion." *Global Networks* 1.

Levitt, Peggy 1998, "Social Remittances: Migration Driven Local-level Forms of Cultural Diffu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2.

Levitt, Peggy & Deepak Lamba-Nieves 2011, "Social Remittances Revisited."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7.

Portes, Alejandro & Luis E. Guarnizo 1991, "Tropical Capitalists: U.S.-bound Immigration and 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In S. Diaz-Briquets & S. Weintraub(eds.),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Mexico and Caribbean Basin Countri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Portes, Alejandro, Luis E. Guarnizo & Patricia Landolt 1999,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 Redfield, Robert 1956,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mart, Alan & George C.S. Lin 2007, "Local Capitalisms, Local Citizenship and Translocality: Rescaling from Below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1 (2).
- Smith, Robert C. 2005, *Mexica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Worlds of New Immigra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ertovec, Steven 2004,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and Modes of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8.
- World Bank 2010,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Factbook 2011*, World Bank Group.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黎相宜）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和亚裔研究学系（周敏）
责任编辑：罗琳